

## 理查德·弗里曼对劳动经济学的贡献<sup>\*</sup>

李 飏 赖德胜

**内容提要:**美国当代著名劳动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将歧视、犯罪等重大社会问题纳入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有效拓展了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边界。他很早就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美国重大劳动经济学问题,通过严谨的理论模型构建和翔实的数据分析,对劳动力市场的重大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观点和解释。本文从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工会问题、比较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问题、创新和科技合作等五个研究领域对弗里曼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介。

**关键词:**理查德·弗里曼 劳动经济学 工会 比较劳动力市场

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B. Freeman)是美国当代杰出的劳动经济学家。弗里曼1943年6月29日出生在纽约州的纽堡市。他于1964年获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1969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弗里曼最初担任耶鲁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1973年返回母校哈佛大学,先后担任经济系助理教授、副教授,1979年起担任经济系教授。他现任哈佛大学经济系Herbert Ascherman讲席教授,哈佛大学绿色建筑与城市研究中心联合主席,哈佛大学劳动与职业发展项目联合主席,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科学与工程人才项目主席,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绩效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由于在不平等与歧视、工会角色、福利国家等领域为劳动力市场改革政策做出了卓越贡献,弗里曼于2006年荣获劳动经济学会明瑟终身成就奖(Mincer Lifetime Achievement Prize),2007年荣获IZA劳动经济学奖(IZA Prize in Labor Economics),2011年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Frances Perkins院士,2016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联合会杰出会士,同年,因在推动全球雇员持股计划上的特殊贡献,获得全球股权组织评审奖(the Global Equity Organization Judges Award)。

弗里曼迄今已发表近500篇论文和20余本专著,其研究兴趣非常广泛,对工会规模的增减、大学生就业、外来移民的影响、贸易与不平等、收入不平等、

中国劳动力市场、歧视与犯罪、志愿者服务市场、流浪汉问题等领域都有所涉及。弗里曼在工会问题和比较劳动力市场两大研究领域的贡献奠定了他在劳动经济学界的泰斗级地位。此外,他在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社会问题、创新和科技合作等领域建树颇丰,本文主要对弗里曼在这些领域的贡献进行评介。

### 一、弗里曼在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研究领域的贡献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在扩张高等教育,所有人都认为高等教育的扩张有利于提高个体收益率,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此时,美国也开始大规模地扩张高等教育。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大学生供给的骤然增长,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大学生及其家长都开始认识到大学生就业困难逐渐成为社会问题。

弗里曼的学术研究开端于对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注,他在《高素质劳动力的就业市场》(Freeman, 1971)一书中就美国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可能带来的就业挑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担忧。弗里曼的经典著作《过度教育的美国人》(Freeman, 1976a)曾一度引起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该书从大学生就业的视角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状况。他首先分析了物理学科的就业市场,然后分析了自20世纪

<sup>\*</sup> 李飏、赖德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875,电子邮箱:lib0023@126.com, lai@bnu.edu.cn。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60年代以来大学入学率迅速增长的事实,认为“婴儿潮一代”集中进入大学、技能偏向型企业的减少和研发经费的缩减等原因导致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工资逐渐降低。1966—1976年期间,大学教育收益率降低了7.8%,高中毕业生与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差距进一步缩小。他预测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会一直持续下去,到80年代初期会略有改善,至80年代末期则会迅速好转。在《劳动力市场变革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Freeman, 1981a)一文中,弗里曼重新回顾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状况。他发现,20世纪70年代,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都不旺盛,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持续降低,并且很多岗位不需要大学文凭。进一步说,持续降低的高等教育收益率对于白人男性的影响尤为明显,未来预期收入降低导致很多白人高中生放弃进入大学深造。从专业来看,受劳动力市场变革冲击最大的是文学、教育、艺术和研究学科,而管理和会计等商科类和工程类专业则基本不受影响。从入学率和学科角度来看,非技术性专业的入学率都在降低,而工程学的入学率在提高。理工类院系的入学率在提高,文学类院系的入学率则遭受重创。弗里曼在多篇论文中强调,对大学而言,大学生就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长期的猜谜游戏”(A long-term Guessing Game),大学希望自己能够先行一步,为市场培养所需的人才。但在现实中,大学往往只能被动地调整自己的方向。那么,随着大学教育收益率逐渐降低,大学生对社会到底还有什么经济价值呢?在《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变化:OECD国家报告》(Freeman, 1981b)一文中,弗里曼通过考察和美国一样正在遭受大学生就业困难的OECD国家,反思了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他分别考察了不同教育程度和职业人群的教育收益率和大学生的失业率及职业分布,指出美国大学生经济价值的降低并非是独特的“北美现象”,而是整个发达国家都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弗里曼巧妙地使用“替代弹性”来分析大学毕业生的供给所产生的影响,指出各国都应该对大学的发展制定更加明确的规划。

## 二、弗里曼在工会问题研究领域的贡献

二战后,工会已经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最主要组织。赫希曼在《退出、发言和忠诚》(Hirschman, 1970)一书中认为有两种处理社会问题的机制:市场进入—退出机制和“商议”的政治性机制。在早期的商业市场上是没有“商议”机制的,

如果对工作不满意,劳动者就会尽快寻找新的工作。但是随着工作搜寻成本的提高,劳动者开始耐心地与雇主谈判,直到联合起来形成“组织”与雇主谈判,因此,工会才得以形成,这正是工会的核心价值——降低交易成本。当时,主流经济学家都强调工会是扭曲合理工资和资源配置的垄断组织。这些学者认为工会会员工资的提高并非市场自发的结果,而是以牺牲未加入工会的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工会既会导致有工会部门的就业损失,也会加剧没有工会部门的就业拥挤。企业经营者和社论评论家也对工会颇有微词,认为工会降低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是典型的官僚机构。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弗里曼对美国工会的发展和产生的影响都做了深入且详尽的论述。弗里曼等发表的《工会是做什么的?》(Freeman & Medoff, 1986)一书是其引用率最高、最富思想性的代表作。弗里曼等在书中利用大量跨部门和跨行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明确指出工会在总体上是有益于经济发展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工会的角色是多元化的,除了垄断的面孔外,工会也扮演着代言人或应答人(The Collective Voice/Institutional Response)的角色。工会改变了企业的内部社会关系,减少了员工的退出和消极怠工,在保护员工利益的同时,工会的一些激励措施也增加了企业的稳定性和管理层的正面回应。(2)工会的工资效应是不可否认的,工资效应随着人群、市场和时期的差异是不同的。但是,随着市场的发展,工会的工资效应会回归到较低水平,给资源配置带来的扭曲是很小的;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工会的工资效应会影响社会的通货膨胀。(3)工会有利于推动就业平等。一方面,通过大量的截面数据证明,工会能够降低工资不平等程度,尤其是工会成员间、白领与蓝领工人间的工资差距;另一方面,实证研究表明工会并不会损害所有非工会成员的利益。事实上,有些非工会工人因工会而受益,特别是就职于大型非工会企业的工人,受到工会冲击的主要是低技能工人。(4)工会作为代表工人利益的社会性组织是有效的。大多数工会在为会员谋求利益上是卓有成效的,例如提高工人福利和话语权,增加工作满意度,改善法律条件,优化谈判机制等。(5)工会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大于阻碍作用。弗里曼等通过实证研究指出,生产率的提升不仅受到市场竞争的刺激,也与良好的劳资关系密切相关,有工会的企业生产率普遍高于没有工会的企业。然而,这是全书最有

争议性的结论,这与企业管理人员的实践经验不符,也受到众多经济学家的质疑。Hirsch(1985)在相关书评中指出,工会并不能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因为加入工会的工人群体本身就拥有相对较高的技能水平;如果工会真的可以提高生产率并降低成本,那么现实中就不会有那么多企业经营者反对工会的存在。

弗里曼对于工会问题的研究脚步并没有随着《工会是做什么的?》这本集大成作品的问世而停止,他在此后的研究中不断随劳动力市场环境的变化修正自己的结论。在《工会是做什么的?》(Freeman, 2005a)一文中,弗里曼指出自己此前的研究遗漏了三个重要问题,即其他国家的工会发展情况、公共部门的工会发展情况以及工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早期研究中,弗里曼坚定地认为较高的工会化水平有利于经济发展,这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是正确的结论。进入21世纪,美国的工会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工人的入会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20%下降到2007年的7.5%,许多传统的集体谈判工会逐渐被淘汰(Freeman, 2008a)。弗里曼进行跨国数据研究后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5年左右,与工会化水平很高的北欧国家、工会化水平中等的爱尔兰等国家相比,虽然美国的工会化水平较低,但是美国的经济表现优于其他国家。因此他指出,仍然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工会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确定性关系。

2002年,美国经历了一场触目惊心的“互联网”泡沫,大量的互联网公司倒闭。从2002年到2014年,弗里曼写了十余篇文章专门研究互联网到底给工会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他认为,互联网的低潮期是短暂的,在传统社会形态下,美国的工会参与率相对较低,大量民众并不认可工会的力量。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让当代青年群体进一步认识工会组织,对于提高工会参与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弗里曼在《从实体走向网络:网络对于复兴工会命运的贡献》(Freeman, 2005b)一文中指出,在21世纪,美国和英国的工会都创新性地使用互联网来实践工会的服务职能,变革工会的组织框架。工会从韦伯式的科层结构向网络化演进,既有利于工会效率的提升,也有利于重塑工会作为工人组织代表的形象。他分析了美国、英国和荷兰工会利用网络的六种方式,包括为工人提供信息、获得并公开工资信息、提供国际工会信息、形成工会竞争、解决产业纠纷、在线教育和培训等。弗里曼认为工会利用互

联网的核心应该是形成开源模式(Open Source Form),充分调动线上和线下活动。因此,他呼吁建立一种他称为“开源工会”(Open Source Unionism)的新型工会,即建立一种基于对话机制而非垄断机制,鼓励社区支持而非对员工施压,充分利用互联网提供服务的工会模式。为此,弗里曼等在《线上和线下帮助工人:利于网络创新工会组织》(Freeman & Rehavi, 2008)一文中对此做了更加详细的交代。他们指出,随着美国工会重要性的衰落,工会的集体谈判能力和工会密度降低了,越来越多的非工会会员反而希望工会发挥作用。弗里曼等使用双重差分法对参加TUC培训的样本进行分析发现,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有利于降低吸纳会员的成本。一方面,互联网对工会集体行动和集体谈判能力会有一定程度的削弱;另一方面,互联网和线下的结合能够避免工会陷入传统模式而不可自拔,从而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新的服务模式。

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私人部门的劳动者参加行业工会的比例急剧下降。针对这一现象,弗里曼等在《工作中的共享资本主义:员工持股、利益共享和股票期权》(Freeman et al, 2010)一文中使用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s)、共享资本主义项目(NBER Shared Capitalism Project)等大量数据分析发现,员工持股有利于维护员工利益,员工持股计划(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是应对私人部门工会率下降的有效措施。

### 三、弗里曼在比较劳动力市场制度研究领域的贡献

随着对美国工会作用的深入研究,弗里曼逐渐把研究目标扩大到劳动力市场制度,尤其是美国以外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着重研究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经济产出之间的因果关系。弗里曼以国际比较的视野研究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并把“制度和政策因素”纳入到对劳动力市场行为的研究中。他的研究不仅包含丰富的文本资料,而且还有通过调研和访谈等得到的大量一手研究资料。弗里曼的研究对象包括韩国、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德国、瑞典、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以及阿根廷、秘鲁、多米尼加共和国等拉美国家。他善于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各国劳动力制度的特征及其对美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制度的借鉴作用,对各国的失业保险、最低工资、劳动法等劳动力市场制度和法规等都有一定研究。弗里曼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是站在宏观视角的,他的研究多是应

对全球化时代劳动力的全球性流动以及“新经济时代”的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作用所提出。弗里曼非常重视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写了多篇著作讨论各国是如何应对“新经济时代”的劳动力市场变革的。他认为所谓的“新经济时代”就是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所产生的经济活动的变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二战后,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构成、工作类型、制度规则、工资结构、失业情况等发生了重大变化。弗里曼等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动:1948—1980》(Freeman et al, 1980)一文中指出,美国劳动力市场上有七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包括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者的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需求结构显著变化,工会化率下降,公司和工会的运行机制发生变革,工资结构发生变化,失业率发生变化。他们指出,虽然劳动力市场机制会产生很大影响,但是这种效应是由一系列机制所产生,很难确定其中某些机制的有效性。美国应该充分借鉴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劳动力市场变革时所实施的制度调整和政策选择。

弗里曼等在《长期失业环境下的工作搜寻与工资:以西班牙为例》(Freeman & Alba-Ramirez, 1990)一文中研究了西班牙的失业保险的作用。研究发现:(1)拥有失业保险的人比没有失业保险的人长期失业的可能性提高了30%。(2)长期失业者一般都是“次要的”工人,一般都享有不同程度的福利保障。他指出失业周期与劳动力市场供给和工作搜寻有关,但是长期失业者正在创造一个失业阶层,这对经济复苏非常不利。

弗里曼等在《工资和技能差异在美德就业差异中的角色》(Freeman & Schettkat, 2000a)一文中明确指出美国相对于德国有更大的就业空间,这与美国更大的工资弹性和更少的就业管制政策密不可分。他们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美国就业率相对较高归功于更多的熟练工人。1995年,服务业占美国和德国就业人口的比重分别为73.34%和59.12%,已经成为容纳就业人口最多的行业。弗里曼针对两国服务业较大的就业差距,思考究竟是过高的基本工资、较高的劳动力成本还是其他原因所致?在《低端服务业——解释美德差异》(Freeman & Schettkat, 2000b)一文中,弗里曼等以低端服务业为例,解释两国在服务业领域的就业差异。他们指出,德国低端服务业存在显著的“就业赤字”现象,即低端服务业的劳动者需求旺盛,但是就业供给严重不足。同时发现,

两国在低工资部门的基本工资非常接近,德国低端服务业的容纳能力不足并非平均工资过高所致。他们认为,相对于美国,德国产业内部的工资分布相对集中,这种缺乏弹性的工资制度限制了德国低端服务业的就业空间。因此,弗里曼等认为特定的制度环境中行之有效的就业政策不一定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依然有效。比如,儿童友好型家庭政策(Child-friendly Family Policy)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德国的就业和经济发展,而这种政策在美国未必有效。

弗里曼详细对比美国和欧洲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差异后指出,人口扩张事实上并非欧美劳动力市场差异的主要原因。《全球劳动力制度研究》(Freeman, 2008b)一文是研究全球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重要文献,不同于大部分研究者使用跨国数据,该文更多使用微观数据,以及模拟和实验研究去分析劳动力机制如何影响经济表现。他通过该文分析了跨国劳动力机制对国家经济表现的影响,并回顾了经济学家已经了解的这些机制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总体而言,有三种机制影响经济表现,即改变激励机制,促进高效的讨价还价,增加信息、交流和信任。有证据表明,劳动力市场机制降低了工资的分散程度和收入不平等,但是对就业和失业的影响是不明确的。

值得注意的是,弗里曼关于美国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优劣判断一直都是比较中立的,他在《美国劳动力市场是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典范吗?》(Freeman, 2000a)一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远远低于日本、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并有望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典范。他指出,美国的充分就业与财政盈余、“母亲回归工作”运动的推进、股票市场的繁荣以及犯罪率的降低等政策和制度变革密不可分。然而,如果要正确评估一国是否达到“高峰经济”(Peak Economy),就应该摆脱单一指标,建立一个综合指标体系,包含核心经济指标上的优势地位、收入分配的均衡程度、经济优势的持续时间、邻国的经济状况、幸福感程度、制度变革的成本、制度选择等七个维度。他认为美国在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上都名列前茅,在女性就业政策和维护员工权利方面卓有成效,但在收入分配上有待提高。如果美国能够通过有效的制度措施促进充分就业,将极大地推动高峰经济的来临。

同时,由于评估宏观制度对经济效果的影响非常困难,弗里曼提出可以通过对公司层面制度的研究来弥补这一困境。在劳资关系中常常会出现雇员认为自己的收益与其付出不一致进而消极怠工的问题

题,因此,如何克服雇员的“搭便车”行为是公司管理制度中的重要议题。弗里曼提出公司应该建立“共享资本主义”(Shared Capitalist)的劳资模式,通过联合监管和抵制懒惰行为来改善公司行为和公司绩效。弗里曼等在《创造更大的派:员工持股、利益共享和股票期权的效应》(Blasi, Freeman et al, 2008)一文中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提高政策效率、放松监管、现金奖励和员工持股计划等对降低缺勤率、增加员工忠诚度、工作产出等都有正效应。在《工作中的共享资本主义:员工持股、利益共享和股票期权》(Freeman et al, 2010)一文中,弗里曼等指出,“共享资本主义”是指一系列基于公司绩效的员工薪酬的补偿性实践,是一种群体激励措施,主要包括员工持股、个体员工持股、利益共享、利润共享、股票期权五种形式。

#### 四、弗里曼在社会问题研究领域的贡献

弗里曼不断吸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等经济学家关于行为选择的理论,构建了比较完善的“职业选择”(career choice)模型,并把歧视、犯罪等社会问题纳入职业选择模型加以解释。弗里曼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源于其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严重的种族问题的忧虑,他开拓性地把歧视、犯罪、福利国家等问题与劳动力市场结合起来,通过就业视角分析美国经济发展、失业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从弗里曼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国的众多社会问题都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设计密切相关。由于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问题,黑人青年就业者没有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大量辍学者和青年失业者的集聚又恶化了美国的犯罪率和社会治安问题。大量合法和非法移民的流入,则进一步压缩了美国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空间。

##### (一) 犯罪与劳动力市场

犯罪问题是任何学者讨论社会问题时都绕不开的话题。法学家从惩罚机制和法律准则的角度阐释如何减少犯罪。教育经济学家认为学校入学率的增长会减少犯罪的发生。犯罪经济学家则从“成本—收益”角度把犯罪视作人们在权衡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基础上的理性选择,一些人成为“罪犯”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先天遗传、心理机能或者是个人道德范畴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他们从事犯罪活动的成本和收益存在差异。贝克尔在《论犯罪与刑罚的经济学》(Becker, 1968)一文中指出,犯罪经济学模型应包含社会净成本、逮捕和定罪成本、惩罚成本等,应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最优政策是资源最优配置

的一部分。弗里曼则绕开了经济学家对于成本的关注,把研究重心放到犯罪与劳动力市场的关联上。

美国虽然有很严厉的刑罚及很高的拘押率,但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在《犯罪与劳动力市场》(Freeman, 1982)一文中,弗里曼认为对于犯罪问题的关注不应该局限于制裁罪犯,也不能忽略劳动力市场环境对犯罪的影响。他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跨区域数据和个体数据研究了失业率、就业环境等劳动力市场变量对犯罪的影响,并比较了“劳动力市场—犯罪”和“制裁—犯罪”两种分析框架的差异。弗里曼指出,劳动力市场与犯罪之间的关联机制弱于“制裁—犯罪”机制,但是仍然是制止犯罪的有效机制。

沿着“劳动力市场—犯罪”的关联机制这一思路,弗里曼深入探讨了犯罪与弱势青年就业问题。弗里曼在《沉闷科学的实践者?我吗?绝不!》(Freeman, 2008a)一文中指出,除了极少数职业罪犯外,大多数弱势青年长期在劳动者和罪犯两种角色间徘徊,犯罪已经成为弱势青年尤其是黑人青年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犯罪也应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青年职业选择”,否则就会高估美国在治理失业问题上的作为。在《犯罪与弱势青年就业》(Freeman, 1991)一文中,弗里曼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弱势青年的犯罪活动,发现大量青年罪犯(尤其是黑人青年)都是高中辍学生,他们如果曾被羁押、判处缓刑或者假释,就很难找到新的工作。通过这些发现,他关于劳动力市场对犯罪的影响有了更加深刻的解读,指出犯罪已经成为失业青年的“本性”,相对于日益减少的工资和就业率,犯罪的回报对弱势青年更有诱惑。

##### (二) 歧视与劳动力市场

二战后,美国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但是黑人和妇女仍然没有受到社会的平等对待。因此,伴随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平权运动的开展,美国国会于1964年通过了《公民权利法》,从法律上规定少数民族裔和弱势群体在应聘时应当受到“优先照顾”。但是,法律上的规定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落实,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黑人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上仍然受到显著歧视。弗里曼在《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分析、发现与问题》(Freeman, 1974)一文中指出所谓歧视是指雇主、雇员、工会、消费者等对不同就业群体有不同的劳动力需求,从而导致这些就业群体的工资、就业率和职业获得产生差异。虽然弗里曼指出政府在促进黑人提高劳动力市场地位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认为20

世纪70年代美国平权运动的成果是“戏剧性的”，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的确减少了，尤其是一些原本只能接受教职的黑人本科生逐渐进入到商业领域，并获得更高的收入及社会地位。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结论，弗里曼在《1964年以后黑人劳动力市场成果是持续的还是暂时的？》(Freeman, 1981c)一文中以《公民权利法》出台的年份为分水岭，分析了1964年以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表明黑人劳动力就业环境变好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更重要的疑问是，这种现象是持续的还是暂时的？弗里曼承接之前对于“歧视”概念的定义，指出衡量黑人经济成就应包括工资、职业获得和就业率三个指标。文章分析了不同群组间黑人的相对经济地位，大量证据表明1964年以后的这种变化是相对稳定的。通过衡量工人工资和职业获得可以发现，黑人劳动力的就业条件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好转，不同群组的工资水平也说明黑人收益并没有随着经济放缓而消失。然而，这并不能说明美国就业市场便不存在歧视了。弗里曼等在《就业和失业的转化》(Ballen & Freeman, 1986)一文中从就业与失业相互转化的视角分析了黑人青年失业的问题。实证研究发现：(1)黑人青年失业率低于白人青年。(2)相对于种族差异，黑人青年内部形成的就业者和无业者之间的差异更大，而且这种差异才是劳动力市场上种族差异和种族问题的核心。(3)一般环境下的黑人青年和白人青年都不太可能会让自己处于长期失业的状态，而贫民窟的黑人青年则会放任自己处于无业状态。(4)贫民窟的黑人青年在未来重回劳动力市场的成本非常高昂，他们很难从无业者转化为就业者。

### (三)移民与劳动力市场

美国社会对于移民问题的态度分为两个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前，美国社会和学术界都比较认可1965年的移民改革法案，对移民持比较开放的态度。但是，8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学家开始大量批评移民对低技能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冲击作用。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合作越来越密切，进出口贸易占GNP的比重从1970年的16%上升到1990年的25%。同时，涌入美国的合法和非法移民总计达七八十万人。绝大部分移民进入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并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20世纪90年代，中国、印度、俄罗斯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则深刻影响了全球劳动力供给结构。移民问题令经济学家对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和美国本土低技能工人的生存状况深表担忧。

移民的增加到底会如何影响一国的相对劳动力供给和相对工资呢？弗里曼等在《移民和贸易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Borjas, Freeman & Kats, 1991)一文中指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低技能劳动者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和就业率都是有所下降的，但是这种下降是否是由于大量低技能移民涌入所导致则有待进一步研究。他们通过实证分析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指出高中以下学历移民的涌入对美国本土低技能劳动者的冲击很大。1988年，由于贸易和移民的增长，美国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上男性和女性高中辍学生的比例分别增加了28%和31%。其中，贸易和移民每增长10%，高中辍学生的周平均工资会下降13%到15%。紧接着，弗里曼等在《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的效应》(Borjas, Freeman & Kats, 1996)一文中运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分析了移民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首先，使用区域分析来回答不同区域受到移民的影响程度，其次，把移民作为劳动力市场供给的一部分，使用要素比例分析发现，移民对高中毕业工人和高中辍学工人的工资下降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最终，结论认为移民的跨区域流动会对美国劳动力市场形成显著的稀释效应。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美国的角色发生一定变化。弗里曼在反思全球化对美国的影响后，对于移民问题产生了新的观点。在《人口的全球化流动》(Freeman, 2006)一文中，弗里曼坚定地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态势，人口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有利于全球经济发展、提高要素禀赋、改善贸易模式并加快技术转移。他认为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实施更加宽松的人口流入政策，甚至建议通过竞卖绿卡或者征收移民税费等“激进的经济政策”来鼓励发达国家接纳更多移民。

## 五、弗里曼在创新和科技合作研究领域的贡献

二战以后，美国一直在科学技术领域独占鳌头。1970年，美国大学入学率达到29%，产生了全球近半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40%的科研成果、32%的科研论文和57%的学术引用数量(Freeman, 2015)。在某种程度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依靠高技术人才垄断了科学技术领域，发展中国家只能从事低端的工业生产。随着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上的优势逐渐凸显，他们不仅在低技能工作领域对全球劳动力格局产生了影响，也从国家人才战略层面上培养了大量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人员。以中国为例，近

年来,中国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博士人数远远超过美国。印度和中国庞大的高学历工人总量将摧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传统贸易模式,进而威胁到美国的创新能力和高技术人才的薪资水平。

作为美国科学促进会的重要成员,弗里曼一直非常关注美国的科技发展,并强调“有益知识”的重要性。弗里曼早在《科技人才市场的供给与工资演变》(Freeman, 1975)一文中就提出,美国的科技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在经历显著的变化,短期内科技人才的收益率在降低。紧接着,弗里曼等在《预测未来的博士劳动力市场:政策陷阱》(Freeman & Brene-man, 1976)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美国要避免短视,避免在科研投入上后继无力。目前,弗里曼正在参与制定美国的科技政策,尤其是科技移民和留学生政策,也参与了美国多个科技协会和科学项目。他对于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就业问题、科学理念与创新的转化等问题都给出了独到见解,这与他对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以及全球化对美国的影响的研究密不可分。他敏锐地观察到,美国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占比的迅速缩减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要想在全球科研和创新领域保持强劲势头,就必须另谋出路。

随着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高等教育和科研经费投入的持续增加,这些发展中国家在科研领域加快了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弗里曼看到了这一转变,并密切关注中国的科技进步与美国的科技进步是什么关系,美国应如何适应中国等国家在全球科技中角色的转变。弗里曼在《移民、国际合作与创新:全球经济中的科技政策》(Freeman, 2015)一文中指出,美国科研人员中国际留学生、外籍科学家和工程师占了较大比重,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合作产生的科研论文和科研引用数量也有显著增加。从国际合作的角度看,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主要科研合作伙伴。他建议美国政府放宽移民政策,增加科研奖励,鼓励全球科学家到美国开展科研合作和科学研究,并明确指出“吸引科技移民的关键在于留住占美国大学生半数以上的国际留学生”(Freeman, 2010)。弗里曼鲜明地指出,知识全球化使得科学与工程政策已经成为21世纪的工业化政策,美国要从知识全球化中获利就必须进一步扩大知识全球化的范围,并通过平衡科技移民和本土科研力量来最大化美国的利益。弗里曼等在《中国在科学和工程学上的“大跃进”》(Freeman & Huang, 2015)一文中指出,知识全球化是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途径,且专门强调了中国能够在全世界科研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为何要增加科技合作》(Freeman et al, 2014)一文中,弗里曼等通过对国际和国内论文合作者的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了合作者的关系和态度,所得出的结论是:(1)美国学者之间跨城市合作和跨国合作都在显著增加。(2)面对面的国际会议非常重要,很多跨国合作者初次见面都源于国际会议。(3)国际合作的目的是充分调动合作者不同的知识和技能,大型跨领域科学比小型实验室科学更依赖国际合作。(4)在生物科学领域,国际合作论文的引用率要高于国内合作论文;然而,其他学科领域并没有这种现象,有国际合作者的论文反而引用率相对较低。

## 六、简评

弗里曼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美国经济学会在授予弗里曼2016年度杰出会士的颂词中,称弗里曼是“在所涉各个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劳动经济学家”。在弗里曼的研究生涯早期,经济学缺乏足够的微观数据和实证研究条件。随着经济学的不断完善,弗里曼一直在研究新的经济学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方法,通过研究可操作的问题,建立数据库,调研并掌握一手资料等方式推动经济学摆脱“沉闷科学”(Freeman, 2008a)的印象。弗里曼很早就使用计量模型研究工会对劳动生产率、经济发展、劳动者收入水平等的影响,他的研究结果大多与美国社会发展状况相吻合。随着美国工会化程度降低,弗里曼把“互联网”等新技术要素引入到工会问题研究中。弗里曼等还从工会的角度对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做出辩护,认为“新《劳动合同法》的施行提高了农民工工作企业的工会覆盖率”(李小瑛、Freeman, 2014)。

劳动力市场制度和规则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弗里曼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探究视角是多元且深刻的,他不仅动态地比较美国与OECD、阿根廷、日本等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差异,也反思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政策问题。通过比较,弗里曼认为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完善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但是对于经济产出的影响则是间接且难以评估的。另一方面,弗里曼充分利用美国公司制度的独特性,从公司层面分析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指出应建立“共享资本主义”的劳资模式以减少企业员工搭便车现象。

作为一个社会观察者,弗里曼对投票制度、福利国家、社会歧视与犯罪等社会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他用扎实的学术研究拓展了现代劳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作为实证研究者,他用数据研究证明美国的种

族和工龄歧视仍然比较严重,歧视的减少有利于改善美国劳动力市场环境。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政府推行了严格的反移民政策。一方面,美国严格限制墨西哥移民和欧洲难民的涌入,这种政令限制与弗里曼关于移民所带来的就业和工资“稀释效应”的分析相一致。另一方面,美国对于穆斯林地区的科技移民及工作签证的限制,却与弗里曼所倡导的积极的科技移民政策相违背,这些政策不利于美国的科技人才储备。

弗里曼非常重视全球科研人员的激增,呼吁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增加科研经费投入以避免长期的潜在损失。弗里曼近年来频繁地出访中国,参与中国的高端学术研讨会,并对中国在知识全球化浪潮中扮演的角色持积极态度。他逐渐把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目光聚焦到中国的循环经济和领域,主持了中国空气净化项目(China Air Filtration Project),并且和清华大学在高效节能领域开展合作,主持中国创新与科研人才项目(China Innovation and Science Work Force),积极肯定中国在科研创新领域的贡献和潜力。他甚至预测在未来10到15年内,中国有可能会成为全球科研的领军者。正如弗里曼等在《中国在科学和工程学上的“大跃进”》(Freeman & Huang, 2015)一文中所说,“崛起的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一个崛起的中国。”随着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将进一步显现。中国大学生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大学生教育收益率存在短期下降的趋势。但从国家层面上,高等教育的扩张为国家创新提供了充足的科学和工程人才储备。中外的科研合作也逐渐收到成效,我国留美大学生回国的比例迅速回升。弗里曼所提倡的增加科研合作和科研移民,以稳固科研创新能力的战略,为我国创新提供了新的改革思路。

#### 参考文献:

理查德·弗里曼 詹姆斯·梅多夫, 2011:《工会是做什么的?》,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小瑛 R. B. Freeman, 2014:《新〈劳动合同法〉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劳动经济研究》第3期。

Ballen, J. & R. B. Freeman (1986), “Transitions between employment and nonemployment”, in: R. B. Freeman & H. Holzer (eds), *The Black Youth Employment Cris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lasi, J. R., R. B. Freeman, C. Mackin & D. L. Kruse (2008), “Creating a bigger pie? The effects of employee ownership, profit sharing, and stock options on workplace performanc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4230.

Borjas, G. J., R. B. Freeman & L. F. Kats (1991), “On the labor market effect of immigration and trade”, NBER Working Paper, No. 3761.

Borjas, G. J., R. B. Freeman & L. F. Kats (1996), “Searching for the effe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2):246-251.

Becker, G. S. (1968), “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2):169-169.

Freeman, R. B. (1971), *The Market for College Trained Manpow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reeman, R. B. (1973), “Changes in the labor market for black American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4(1):67-131.

Freeman, R. B. (1974), “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Analysis, findings and problems”, in: M. D. Intriligator (ed), *Frontiers of Quantitative Economics*, Vol II, North-Holland.

Freeman, R. B. (1975), “Supply and salary adjustments to the changing science manpower market: Physics, 1948-197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5(1):27-39.

Freeman, R. B. (1976a), *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 Academic Press.

Freeman, R. B. (1976b), “A cobweb model of the supply and starting salary of new engineers”, *Industrial Labor Relations Review* 29(2):236-248.

Freeman, R. B. (1980a), “The exit-voice tradeoff in the labor market: Unionism, job tenure, quits, and separ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4(4):643-673.

Freeman, R. B. (1980b), “The effect of unionism on worker attachment to firms”,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1(1):29-61.

Freeman, R. B. (1981a), “Implication of the changing U. S. labor market for higher educ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697.

Freeman, R. B. (1981b), “The changing economic valu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developed economies: A report to the OECD”, NBER Working Paper, No. 820.

Freeman, R. B. (1981c), “Have black labor market gains post-1964 been permanent or transitory?”, NBER Working Paper, No. 751.

Freeman, R. B. (1981d), “Black economic progress after 1964: Who has gained and why”, NBER Working Paper, No. 282.

Freeman, R. B. (1981e), “The effect of trade unionism on fringe benefits”, *Industrial Labor Relations Review* 34(4):489-509.

Freeman, R. B. (1982), “Crime and the labor market”, *Economic Commentary* 7(8):858-859.

Freeman, R. B. (1991), “Crime and the employment of disadvantaged youth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7(6):697-711.

Freeman, R. B. (1998), “War of the models: Which labour-



- market institu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Labour Economics* 5(1):1—24.
- Freeman, R. B. (1999), “Area economic condition and the labor market outcomes of young men in the 1990s expans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7073.
- Freeman, R. B. (2000a), “Is the U. S. labor market the model for advanced countries?”, *Canadian Public Policy* 26(1):187—200.
- Freeman, R. B. (2000b), “The divergence in employmen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EU and the U. S. ”, in: B. Marin et al (eds), *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Welfare*, Ashgate Publishing.
- Freeman, R. B. (2001), “The shared capitalist model of work and compensation”, *Reflets Et Perspectives De La Vie économique* 40(1):169—181.
- Freeman, R. B. (2002), “The labour market in the new information economy”,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8(3):288—305.
- Freeman, R. B. (2004), “Are European labor markets as awful as all that?”, *General Information* 5(1):34—39.
- Freeman, R. B. (2005a), “What do unions do? The 2004 Mbrane stringtwister edi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410.
- Freeman, R. B. (2005b), “From the webbs to the web: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ternet to reviving union fortunes”, in: S. Fernie & D. Metcalf(eds), *Trade Unions: Resurgence or Demise?* Routledge.
- Freeman, R. B. (2006), “People flows in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2):45—70.
- Freeman, R. B. (2008a), “Practitioner of the dismal science? Who, me? Couldn’t be!”, *American Economist* 52(2):166—186.
- Freeman, R. B. (2008b),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Lse Research Online Documents on Economics* 38(1):21—22.
- Freeman, R. B. (2010), “What does global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mean for the U. S. ?” in: C. T. Clotfelter (ed),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 a Global Marke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reeman, R. B. (2015), “Immigratio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 W. R. Kerr et al(eds),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irschman, A. O.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irsch, B. T. (1985), “What Do Unions Do? Comments by reviewers”, *Industrial & Labor Relations Review* 38(2):247—250.
- Freeman, R. B. & D. Breneman(1976), “Forecasting the Ph. D. labor market: Pitfalls for policy”, *Cold Spring Harbor Symposia on Quantitative Biology* 30(6):75—82.
- Freeman, R. B. & J. Medoff(1986), *What Do Unions Do?* Basic Books.
- Freeman, R. B. & A. Alba-Ramirez(1990), “Jobfinding and wages when longrun unemployment is really long: The case of Spain”, NBER Working Paper, No. 3409.
- Freeman, R. B. & R. Schettkat(2000a), “The role of wage and skill differences in U. S. -German employment differenc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7474.
- Freeman, R. B. & R. Schettkat(2000b), “Low wage service: Interpreting the U. S. -German difference”, NBER Working Paper, No. 7611.
- Freeman, R. B. & J. Rogers(2002), “Open source unionism: Beyond exclusive collective bargaining”, *WorkingUSA: Journal of Labor and Society* 7(2):3—4.
- Freeman, R. B. & M. Rehavi(2008), “Helping workers online and offline: Innovations in union and worker organization using the Internet”, in: D. Autor(ed), *Studies in Labor Market Intermedi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reeman, R. B. & E. Han(2012), “The war against public sector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the U. S. ”, *Annual Review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54(3):386—407.
- Freeman, R. B. & W. Huang(2014),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U. S.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A new special relationship?”, IZA Working Paper, No. 7963.
- Freeman, R. B. & W. Huang(2015),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in: A. Geuna(ed), *Global Mobility of Research Scientists: The Economics of Who Goes Where and Why*, Elsevier.
- Freeman, R. B. et al(1980),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labor market, 1948—80”, in: M. Feldstein(e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reeman, R. B. et al(2010), “Introduction”, in: R. B. Freeman et al(eds), *Shared Capitalism at Work: Employee Ownership, Profit and Gain Sharing, and Broad-based Stock Op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reeman, R. B. et al(2014), “Why and wherefore of increased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in: A. Jaffe & B. Jones(eds), *The Changing Frontier: Rethinking Science and Innovation Pol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责任编辑:李仁贵)

(校对:刘洪愧)